

# 以理念创新推动超大城市 年鉴质量整体提升

——以武汉市年鉴工作为例

王筱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和总体安排，强调要“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sup>①</sup>，为新时期推进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贯彻改革精神，解决年鉴产品“供需落差”问题，开展“供给侧改革”，打造真正为各方所需和人民群众认可、经得起时代检验的精品良鉴，需要树立精品意识，坚持守正创新，勇于“打破年鉴编纂的路径依赖，改变类目设置的思维定式、内容记述的习惯做法、规范编纂的教条观念”<sup>②</sup>。近年来，武汉市在年鉴编纂工作中积极吸取业内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经验，围绕武汉市这座超大城市的特点特质，以理念创新为先导，在全力推进市级年鉴精品创建基础上，分析各区年鉴实际情况，建立梯队培养机制，下力气提升区级地方综合年鉴质量，不断推动全市年鉴工作整体水平迈上新台阶。

## 一、在功能属性上把握公共文化产品定位

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属性和定位，行业内从组织编纂方式、信息资料来源、功能作用发挥等不同角度有多种不同认识<sup>③</sup>。但在笔者看来，只有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和需求出发，对地方综合年鉴性质进行界定，将其明确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以“有用”“宜用”作为评判年鉴质量的主要标准，才能明确创新路径和方向，优化内容供给，使其始终保持生命力，最大化发挥年鉴的作用和价值。

---

\* 王筱武，男，湖北省石首市人，湖北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史、年鉴学。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3版。

② 牟国义：《新时代年鉴编纂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和实践意蕴》，《中国年鉴研究》2023年第3期。

③ 朱彩云：《年鉴研究中理论观点异同说（上）》，《江苏地方志》2018年第5期。

第一,地方综合年鉴符合公共文化产品的基本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规定:“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sup>①</sup>与作为面向市场的图书出版物的西方年鉴不同,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政府主导,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组织编纂,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地域年度情况无所不包,是政府公共信息记录和传播的重要平台。编纂年鉴的一个目的是满足民众对地情信息的需求,从这个角度看,地方综合年鉴具备天然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特性。

鉴于此,《武汉年鉴》在选题选材上,着力加大对公共信息的反映力度,突出所收录资料的社会价值,削减来稿中反映部门常规性事务、行政管理过程性措施等内向性信息的比重,以增加“延伸阅读”类背景资料、充实图表、详列具有年度可对比性数据、提高有效信息含量等方式,充分体现民生保障、生态治理、权益保护等为民众所关心关注的内容。区级年鉴也在如何提升公共服务功能上开展诸多探索,如《江汉年鉴(2024)》设置“公共安全”类目,集中记载应急保障、防灾救灾、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和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内容。

第二,将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公共文化产品是体现其人民性内涵的本质要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地方综合年鉴作为“纪年之书”,本质上要求需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将更多笔墨聚焦在人民群众身上,把满足人民群众对年鉴的需求和对年鉴工作的要求作为编纂地方综合年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把握和认识年鉴编纂组织方式与所应记载主体内容之间的关系,克服篇目部门化、内容空洞化倾向,有效融合宏观记事的“高度”和贴合民生的“温度”,拉近年鉴与老百姓的距离,做到在服务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同时,“在服务社会和百姓上多动脑筋、多下功夫,多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用多种手段、多种表现方式做好服务工作”<sup>②</sup>,实现为国存史和为民编鉴的统一。

《武汉年鉴(2022)》在创建中国精品年鉴过程中,大量补充社会民生相关内容,将“教育”“卫生健康”等社会部类的分目从上卷的28个增加至43个,大幅提高数量占比;加大反映与老百姓生活品质息息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情况,增设“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等类目,充实商贸服务业内容;全面消除部门痕迹,如文化旅游部分,由之前归并记述,修改为将“文化”单独设为类目,“旅游”作为产业类型归入经济部类;整合优化“社会生活”类目条块设置,取消存在概念交叉的“居民生活”分目,将不属于一个事务分类体系的“人力资源和社会管理”“退役军人事务”内容移入其他类目,新补充“人口家庭”“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基层社会治理”等分目,条目由上卷的76个增加至90个。<sup>③</sup>

第三,把握公共文化产品定位是打磨年鉴质量和提高年鉴价值的有效途径。将地方综合年鉴界定为公共文化产品,就要从满足社会的需求出发进行资料加工和信息呈现。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6年12月25日。

② 沈国晴:《对年鉴创新的几点思考》,《江苏地方志》2010年第1期。

③ 武汉年鉴社编:《武汉年鉴(2022)》,武汉年鉴社,2022年。

资料信息是否取舍得当、归类科学、层次清晰、逻辑严密,是决定年鉴作为公共文化产品服务功能是否得到充分发挥的关键因素。年鉴编纂者需要从有利于资料价值发挥的角度,构建篇目框架层级,处理常设类目与升格类目的关系,把握静态条目与动态条目的篇幅比例,做到收录全面系统、编排有序合理、内容详略得当。例如,《武汉年鉴》自2021年卷起,就从增加资料承载量和加强深度记述的角度出发,由之前全书大中类的混杂结构,调整为中类结构,将“政治”从大篇目改设为中篇目,一分为七,设立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检监察、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等类目,全面扩展资料容量。再如,紧密结合受众需求,从自身定位和服务内容出发,放大年鉴自身优势,增加系统性、综合性信息在年鉴中的比重,合理设置年鉴条目,提供具有全局性的资料,体现年鉴的独特作用。

## 二、在内容呈现上突出超大城市的特色特质

没有特色的年鉴一定不是精品年鉴。要改变“千鉴一面”,做到“常编常新”,必须在年鉴内容呈现上体现出时代性和区域特色,贴近反映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将具有鲜明时代标识的新发展格局、新经济业态、新改革成果更多更直接地反映到年鉴的篇目架构和内容呈现上,已经成为年鉴界共识。在如何彰显年鉴时代性、年度性、特色性等一般性认识方面,业内也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sup>①</sup>但具体围绕超大城市年鉴开展的个案分析,尚不多见。从武汉市已开展的实践探索看,与一般城市年鉴相区别,超大城市年鉴在内容呈现上需要从反映战略使命、引领区域发展等方面着重发力。

第一,重点体现超大城市所承接的战略使命。超大城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实验室”,担负着大量国家战略和试点任务。超大城市地方综合年鉴对此应该有充分全面的记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武汉时多次指出,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湖北武汉科教人才优势突出、科技创新能力较强,要在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开拓进取。<sup>②</sup>围绕新一轮国家创新战略在武汉市的实施,《武汉年鉴》在“科学技术”类日常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要科创平台、新型研发机构、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建设等条目,紧贴时代热点,记录武汉市发挥科教人才优势、深入推进科技强国战略方面作出的努力;贴合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自2021年卷起增设“新兴产业”类目,记录航空航天产业、北斗产业、人工智能产业、氢能产业等发展状况,反映武汉市作为超大城市在开辟引领产业升级和未来发展赛道中的前瞻规划布局;着重在“工业”“数字经济”类目中体现四大国家级产业基地建设、智能制造和数字化低碳转型进展等方面的内容。《江汉年鉴》《江夏年鉴》等区级年鉴也增设“文化创意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大健康产业”等类目或分目,凸显各区的新产

<sup>①</sup> 参见董忠:《谈综合年鉴的特色性、信息量与时效性》,《江苏地方志》2004年第6期;付莉:《广度、深度与温度:年鉴记述的三个维度解析》,《中国年鉴研究》2023年第2期;等等。

<sup>②</sup> 《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强调 鼓足干劲奋发进取 久久为功善作善成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人民日报》2024年11月7日第1版。

业格局。

第二,重点体现超大城市在全国高质量发展上的引擎作用。超大城市是我国城镇体系中的“头部”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动力源和增长极的角色,也承担着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重任。《武汉年鉴》在体现武汉的城市定位和城市功能作用发挥方面,专设“武汉都市圈”类目,按“五个同城化”(指规划同编、交通同网、科技同兴、产业同链、民生同保)设置分目,突出反映武汉作为都市圈核心城市,在武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中的“一主引领”作用;专设“区域发展”类目,记载武汉市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任务,开展省内和援藏援疆对口支援合作等方面工作开展情况,彰显武汉在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区域价值。同时,设置“开放型经济”类目,下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外经济合作”等分目,翔实记载高水平利用外资、开展涉外经贸合作、开放平台建设等方面开展的工作,充分展现超大城市作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功能。

第三,重点体现超大城市在现代化治理方面的有益探索。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推动城市功能品质提升,是习近平总书记给武汉提出的重大课题<sup>①</sup>。近两年来,《武汉年鉴》紧贴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主动开展相关资料收录,将相关情况融入法治、城市建设和管理、政务服务、社区建设、乡村治理、生态建设等类目分目,增设“党建引领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智慧城市建设”“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建设”“智慧城管建设”“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攻坚行动”等条目,从不同角度记载全市在提高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进展。

### 三、在经验有效传导上谋实创新

在推动《武汉年鉴》质量提升的同时,武汉市积极提炼总结有关经验,全力指导带动全市各区级年鉴创建精品。

第一,建立有序经验传导链条。坚持以点带面,集中突破,打破“齐步走”均衡发力的传统做法,将全市13个区划分为重点选育、储备培养、对标建设3个梯队,实施分级分类滚动式培养,逐步实现全市区级年鉴整体质量提升。在具体工作推进方式上,对列入年度重点孵化的年鉴,坚持全市一盘棋,建立市区协同互助机制,调配打通全市年鉴系统人员力量,组建工作专班,通过市区上下联动、跨区横向协作,将一地一区的单打独斗变为全市统一攻坚,并带动各区年鉴编纂能力整体提升,形成创精品、带队伍、促发展的良性循环。《汉阳年鉴(2023)》在创建精品过程中,专家反馈178条初稿修改建议,除汉阳外,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年鉴处3名工作人员和其他3个区年鉴编纂人员承担148条意见处理工作,占比达到83.1%;在稿件复审阶段,工作专班在负责部分稿件修改的同时,在

<sup>①</sup> 《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努力打造国际化大都市 探索具有武汉特色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长江日报》2020年6月29日第1版。

分类目对全书书稿进行通读时,发现并处理问题数十项。

第二,加大业务指导力度。首先是坚持“以类系事”“事以类从”原则,推动区级年鉴框架科学重构。全面修正因将不同性质的事物强行归为一类,或将不同层次的事物强行归为一个层次等归类不当问题。例如,针对区级年鉴中比较普遍的在“政策研究”分目下设立“深化改革”条目的做法,通过将“深化改革”升格为分目,与“政策研究”并列,整体全面反映全区改革进程。其次是加强类目分目标题词语概念内涵外延的辨析,避免年鉴内容交叉重复和缺失遗漏。比如“法院”分目,下设的条目至少应包括刑事审判、民事审判、行政案件审判、人民法庭建设等一般法院都会开展的主要审判活动和自身建设情况。“法治政府建设”需涵盖行政决策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复议、行政权力制约监督等内容。按此要求,《汉阳年鉴(2023)》《江夏年鉴(2024)》篇幅都分别增长15%以上。最后是增加条目有效信息含量,去除冗杂信息,消除工作总结痕迹,适应读者需要,补充高价值资料。比如,在民主党派内容中,补充之前缺失的支部设置、人员界别比例、党员年龄结构等方面的内容,实用查考价值明显提升。

第三,推广人才队伍建设经验。年鉴编纂是一项创造性劳动。专业化、职业化的年鉴编纂队伍是创建精品年鉴的根本保障。从武汉市年鉴工作经验看,年鉴编辑的政治素养、学识认知、文字功底,以及对供稿部门的情况了解熟悉程度、资料的取舍加工技巧等,都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年鉴质量的高低。因此,针对区级年鉴编辑人员新老交替、青黄不接、专业性不强等问题,武汉市将育才、强队伍作为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积极推动各区构建有一定规模、人员相对稳定、分工较为明确固定、具有较强事业心责任感、专业能力强的年鉴编纂队伍。同时,有意识地引入全国专家力量,结合区级年鉴审读备案中发现的具体案例,开展专题培训,提升年鉴编纂人员编审技能,仅2024年就先后组织10位外省、市专家召开1次专家篇目评审会、2次初稿审读,举办3期专题培训班,累计培训150余人次。

地方综合年鉴应该准确反映地方特点和城市特质。如何将超大型城市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作用充分反映在年鉴编纂过程中,是当前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全新课题。作为年鉴编纂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创新编纂理念,深化对年鉴功能作用的认识,把准年鉴自身定位,开展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方法创新,才能在做到翔实记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年鉴作为鉴史之书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功用和价值。

责任编辑:张璇